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与地区差异

——基于2012—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胡月, 田志宏*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基于2012—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泰尔指数测算了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 考察了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来源的地区差异非常突出, 其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最为明显。农业政策支持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生产率不是影响农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因素。中国四大地区农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在东部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规模优势的促进作用明显; 在东北地区, 农业政策的支持水平对企业“走出去”的推动和引导作用非常突出; 在中部地区, 产业规模优势有利于提高各省的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在西部地区, 企业遵循着“先出口、后投资”的发展路径, 出口规模对农业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

关键词: 农业对外直接投资; 影响因素; 地区差异; 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 F832.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9)05-0001-07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2 to 2016

HU Yue, TIAN Zhiho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2 to 2016, the article adopts Theil index to measure the regional disparity of agricultur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DI) and examines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e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gional differences prevail in Chinese AFDI, with conspicuous disparities in western regions. Agricultural policy suppor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while productivity is not the main factor to affect AFDI. The determinants in four major regions in China manifest strikingl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e facilit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dustry scale advantages are distinct in the eastern region while in northeast region, the support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is more prominent in pushing and guiding competent enterprises to go globally. However, in central region, industrial scale advantages are beneficial to improving the scale of AFDI whereas in western region, enterprises follow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giving priority to export ov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th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he export scale on AFDI.

Keywords: AFDI; influencing factors; regional differences; productivity

一、问题的提出

自确立农业“走出去”战略以来, 中国农业对

外直接投资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对外农业投资流量从2006年的1.9亿美元增加至2016年的32.9亿美元, 年均增长33.0%。与此同时, 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存在着供给结构失衡的问题, 投资来源分布的地区差异十分显著。截至2016年底, 上海市的农业对外投资存量最多, 达26.5亿美元, 约为陕西省的109倍。从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看, 2016年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主要集中在东

收稿日期: 2019-09-20

基金项目: 农业部财政专项课题(农财发2014-85-58); 农业国际交流与合作课题

作者简介: 胡月(1993—), 女, 辽宁朝阳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产品国际贸易。*为通信作者。

部地区,占全国比重的57.3%,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投资占比分别为5.4%、17.4%和19.9%。省际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仅从总体上表现出显著的“东部高,中西低”的分布格局。中国不同地区的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何以呈现出如此的分布格局?哪些因素导致了各地区农业投资规模的失衡?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对协调各地区农业共同发展、促进中国农业“走出去”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学界对农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对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和企业投资案例的描述性分析,旨在揭示目前农业“走出去”的制约因素和未来发展趋势^[1-4]。二是对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东道国区位选择研究,这类文献在有关农业投资的实证研究中占比最多,证实东道国农业自然资源、市场规模、制度因素是影响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主要原因^[5]。三是对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这类文献相对较少,且大多局限在对宏观数据层面的分析。宋洪远等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外汇储备、技术条件的成熟度是影响中国农业投资发展的重要因素^[3];陈伟认为当前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处于投资发展周期(IDP)的第二个阶段,生产率是决定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6]。

文献梳理表明,以往研究对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对不同地区影响因素的差异更是缺乏分析。中国地域辽阔,区域特征复杂,各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贸易开放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从地区层面探讨影响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分析其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非常必要。鉴于此,笔者拟基于2012—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明确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的基础上,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为优化和促进中国农业投资提供参考借鉴。

二、理论分析和模型选择

1. 理论分析

农业对外投资有着与其他产业不同的特殊性,它与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紧密相关。正因如此,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更大的挑战性,面临着更大的环境风险和更长的回报周期。在对外投资过程

中,企业不仅会涉及敏感的自然资源,而且需要高度本地化的参与和与之紧密相关的生产技术。现阶段,中国农业对外投资正处于初级的快速成长阶段,投资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这意味着,农业对外投资活动的开展一方面需要投资主体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和投资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和适当的市场干预。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2012—2016年中国各省的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AODI)。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不平稳,且不能反映投资水平的累积效应,因此笔者使用存量数据衡量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对于解释变量而言,结合中国农业的产业发展特征和当前的投资环境,将影响中国省际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因素归纳为区域因素、产业因素和制度因素3个方面。

一是区域因素,主要包括各省的农业生产率、对外开放度和经济发展水平。

(1)农业生产率(PROD)。异质性贸易理论指出,生产率是决定企业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决定因素。生产率高的企业能够以对外投资或出口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在国内生产经营。因此,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率水平是影响农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原因。从现有文献看,基于生产率视角解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证研究较为丰富,但多数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7-9]。那么,生产率是否是决定一个地区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呢?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之一。笔者选用各省的“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指标测度农业生产率,即“农林牧渔业增加值”除以“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员数量”。

(2)农产品对外开放度(EXP)。传统的国际经济理论认为,企业一般遵循着从出口到对外投资的发展过程,贸易对于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着带动作用,二者之间是补充关系^[10]。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贸易与投资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11]。本文使用历年各省的“农产品出口总额”作为贸易开放度的测量指标,进一步考察出口与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3)经济发展水平(AGDP)。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关系密切。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该

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区开展对外投资的动机越强。本文使用“人均 GDP”指标度量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

二是产业因素。从产业因素的角度来看,影响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包括农业的内部优势和外部规模优势。具体而言,内部优势反映在一个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上,投资能力越强的省份,其开展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更高;外部规模优势使得企业能够共享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规模优势越明显,越有利于提高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12]。

(1) 国内固定资产投资 (FI)。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是一个地区投资能力的具体表象。一定规模的固定资产是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的前提,对于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本研究选用各地区“农林牧渔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指标进行测度。

(2) 外部规模优势 (SCAL)。规模优势具有正的外部性,会对一个地区的相关企业形成明显的带动作用,有利于提升该地区的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笔者使用各地区“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作为规模优势的衡量指标。

三是制度因素。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制度因素会使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形成独特优势,有利于促进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13-16]。从实践中看,制度因素具体体现在政府的政策支持方面。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初期阶段,日韩等国制定了广泛的财政、低息贷款、农作物保险等措施扶植本国企业的发展。本研究使用“农林水事务支出占 GDP 的比例”作为农业政策支持水平 (AZC) 的测度指标。笔者认为,各省用于农业的支出主要表现在投资补贴、长期低息贷款等方面,能够反映各地区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2. 模型选择

为探明农业“走出去”的区域差异特征和影响因素,本文首先使用泰尔指数对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分布的地区差异进行测度,揭示其变化规律;其次,建立实证模型考察各因素对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程度。

泰尔指数是一个相对测度指标,适合于不同空间尺度的地区差异分解,能够把总差异分为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得到组内和组间差异对总体差

异的贡献率,泰尔指数 (T) 表示如下:

$$T = \frac{1}{n} \sum_{i=1}^n \left(\frac{y_i}{\bar{y}} \ln \frac{y_i}{\bar{y}} \right) \quad (1)$$

(1) 式中, T 是泰尔指数, n 为省个数, y_i 为 i 省的对外农业投资存量, \bar{y} 表示所有省的对外农业投资存量的平均值。泰尔指数越小,表明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分布的总体差异越小。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差异可进一步分解为四大地区内差异 (T_w) 和地区间差异 (T_b) 之和,公式如下:

$$T = T_b + T_w = \sum_{k=1}^k p_k \ln \left(\frac{p_k}{n_k/n} \right) + \sum_{k=1}^k p_k \left(\sum_{i \in g_k} \frac{p_i}{p_k} \ln \frac{p_i/p_k}{1/n_k} \right) \quad (2)$$

(2) 式中, k 为群组标记,每组分别记为 g_k ($k=1, 2, 3, 4$); n_k 表示第 k 组 g_k 中的省份数量, p_i 与 p_k 分别表示第 i 省的对外农业投资份额和某群组 k 的投资份额。第 k 群组的组内差异为:

$$T_k = \frac{1}{n} \sum_{i \in g_k} \frac{p_i}{p_k} \ln \frac{p_i/p_k}{1/n_k} \quad (3)$$

另外,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分析各因素对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效果。为减少异方差的影响,对各变量取对数形式(除农业支持水平变量外),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begin{aligned} \ln AODI_{i,t} = & \beta_0 + \beta_1 \ln AODI_{i,t} + \beta_2 \ln AGDP_{i,t} + \beta_3 \ln EXP_{i,t} + \\ & \beta_4 \ln AZC_{i,t} + \beta_5 \ln GYC_{i,t} + \beta_6 \ln SCAL_{i,t} + \\ & \beta_7 \ln FI_{i,t} + \mu_{i,t} \end{aligned} \quad (4)$$

式中, i 表示不同地区, t 表示年份; $AODI$ 、 $PROD$ 、 $AGDP$ 、 EXP 、 AZC 、 GYC 、 $SCAL$ 和 FI 分别是农业对外投资存量、农业生产率、经济发展水平、出口规模、政策支持水平、产业规模优势和固定资产投资额, μ 是随机扰动项。

三、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本文采用 2012—2016 年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外投资数据源于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的农业信息采集数据库。各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主要是 2013—2017 年各省(市、区)的《地区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信息网。需要指出,由于西藏、贵州和青海省的投资数据缺失,故将其剔除。新疆建设兵团、黑龙江农垦和广东农垦的投资存量数据分别计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黑龙江省和广东省,样本共包括 28 个省(市、区)。表 1 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到,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水平为 14.94 亿元,最大值达

176.32 亿元。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ODI	亿元	14.94	23.34	0	176.32
PROD	元/人	24 284.12	8 448.89	8 656.16	48 434.07
AGDP	元/人	52 390.20	22 816.53	22 036.66	118 198.00
EXP	亿元	154.62	218.95	5.07	1 172.10
AZC	—	0.03	0.02	0.01	0.07
SCAL	亿元	2 064.87	1 293.20	113.47	5 182.90
FI	亿元	603.21	433.22	3.95	2 250.44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且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倾向。从国内的区域分布看，目前开展农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最多的省份依次是上海、山东、云南、黑龙江和天津，这 5 个省份的投资额合计占投资存量总额的 57.1%。

2012—2016 年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农业对外投资具有明显差异(表 2)。第一，农业对外投资来源的总体差异表现出波动性上升趋势，5 年的泰尔指数均不低于 0.5，农业对外投资非均衡的现象非常突出。第二，在地区内差异中，东部和东北地区的泰尔指数变化很不稳定，波动幅度大。中、西部地区内不平衡的现象有所缓解，中部地区的泰尔指数从 2012 年的 0.64 下降到 2016 年的 0.15，降幅高达 76.4%。第三，各区域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不同。从 4 个地区泰尔指数的均值来看，西部地区内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差异最为突出。究其

原因，主要是由于广西和云南省的农业对外投资发展明显快于其他省份所致。

表 2 2012—2016 年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区差异

年份	总体差异	区间差异	区内差异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2012	0.675	0.106	0.399	0.640	0.910	0.456
2013	0.590	0.107	0.521	0.376	0.504	0.386
2014	0.500	0.106	0.324	0.460	0.583	0.294
2015	0.617	0.157	0.442	0.117	0.400	0.618
2016	0.592	0.145	0.528	0.151	0.421	0.258

四、实证研究及其结果分析

为明确省际区域性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基于全国层面的总体模型分析；二是在地区层面上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建立 4 个计量模型。同时，考虑到内生性等问题，本研究还进一步做了稳健性检验分析，以求得到更加准确的结论。

1. 总体模型的回归结果

总体模型的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3。(1)、(2)、(3)列分别是采用混合 OLS、随机效应(RE)和固定效应(FE)的结果，3 个模型总体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 F 检验、BP-LM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结果看，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和混合 OLS 模型。因此，对于国家层面的总体模型，采用固定效应(FE)回归。

表 3 基于国家层面的农业对外投资决定因素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混合 OLS (1)	RE (2)	FE (3)	2SLS (4)
lnPROD	0.151(0.545)	-0.233(0.859)	-8.303 ^{***} (3.225)	-5.569(3.432)
lnAGDP	1.608 ^{**} (0.739)	3.841 ^{***} (0.924)	7.092 ^{***} (2.037)	7.840 ^{***} (2.383)
lnEXP	0.458 ^{***} (0.155)	0.426 [†] (0.223)	0.423(0.546)	0.436(0.447)
lnAZC	19.711(11.945)	52.755 ^{***} (13.645)	49.058 ^{***} (13.081)	63.445 ^{**} (21.584)
lnSCAL	0.298(0.299)	0.666 [†] (0.664)	9.642 ^{***} (3.284)	5.473(4.893)
lnFI	0.028(0.177)	0.207(0.213)	-0.023(0.611)	-0.300(0.476)
cons	-11.834 [*] (6.410)	-36.672 ^{***} (6.870)	-54.911 ^{***} (14.219)	-5.569(3.432)
地区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调整后的 R ²	0.270	0.483	0.518	0.476
F 统计量	9.040 ^{***}	—	29.160 ^{***}	—
模型的选择检验				
F 检验	—	—	18.140 ^{***}	—
BP-LM 检验	—	75.280 ^{***}	—	—
Hausman 检验	—	—	72.180 ^{***}	—

注：变量系数右边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表 4 含义相同。

从模型估计结果看,可以得到:

(1) 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政策支持对促进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 1%,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平均提高 7.09%;农业政策支持的促进作用则更为明显。当前中国农业对外投资仍处于相对低水平和探索性阶段,“走出去”战略的发展还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推进。对于那些农业支持程度高的地区而言,一方面可以增加其对海外农业投资的认知程度,促进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政府资源倾斜和融资优势,大大缩小对外投资成本,降低投资风险。

(2) 生产率与农业对外投资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与异质性理论预期不符。从估计结果看,无论是使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还是工具变量法,生产率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为负值。农业生产率水平每提高 1%,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平均减少 8.3%。这一结果与戴翔^[17]的研究结论相似,说明中国农业“走出去”的“生产率悖论”情况是存在的。究其原因,可能是当前中国农业对外投资仍以大中型国有企

业为主,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虽然不一定具有生产率方面的优势,但更易获得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从而可以弥补企业“走出去”中生产率方面的劣势。另外,产业规模优势对企业“走出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不具备生产率优势时,企业能够依托产业规模带来的正向外部效应开展投资活动。

(3) 农产品出口和产业规模优势对农业对外投资的影响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出口与农业对外投资之间表现出互补关系,但其对投资的带动效应较小,不是影响中国农业“走出去”的关键性因素。对于产业规模变量而言,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已不具备显著性,未有迹象表明产业规模优势是促进农业“走出去”的主要原因。

2. 分地区模型的回归结果

为考察各因素对不同地区农业对外投资影响程度的差异,本研究将样本分为东、中、西和东北 4 个地区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与总样本保持一致,分区域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

表 4 分地区农业对外投资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i>lnPROD</i>	-2.932(1.469)	-19.638** (8.047)	-3.027(2.591)	-0.165(0.114)
<i>lnAGDP</i>	6.715*** (1.228)	1.598(4.715)	8.925* (4.170)	1.857(1.856)
<i>lnEXP</i>	-0.096(0.241)	-1.162(1.206)	1.138*** (0.227)	-1.007(0.703)
<i>lnAZC</i>	57.454(38.192)	3.698(3.718)	18.705(44.951)	48.524** (17.359)
<i>lnSCAL</i>	6.438** (2.176)	31.193** (12.565)	2.148(1.825)	3.386** (1.044)
<i>lnFI</i>	-1.031*** (0.261)	0.914(1.016)	0.765(1.429)	-0.596(0.590)
<i>cons</i>	-72.920*** (7.644)	-43.641(33.121)	-78.443** (28.152)	-25.015(20.495)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F 统计量	81.25***	7.01***	8.23***	16.74***

从地区层面看,中国四大地区农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具体结果及分析如下:

(1) 东部地区:影响东部地区农业对外投资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规模优势和固定资产投资。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规模优势的系数为正,固定资产投资的估计系数为负。在所有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人均 GDP 每提高 1%,东部地区的农业对外投资规模平均增长 6.72%。固定资产投资对东部地区农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显著为负,可能是由于在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较大的省份,政府更多依赖于农业资源的良好基础

条件,相对忽视了对海外农业资源的获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走出去”战略。

(2) 中部地区:产业规模优势对中部地区的农业对外投资有正向影响,对外投资的“生产率悖论”现象在中部各省显著存在。从估计结果看,产业规模提高 1%,中部农业对外投资规模平均增长 31.19%。生产率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一结果从侧面反映了中部地区企业开展农业对外投资的意愿低的事实,生产率水平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在国内生产。

(3) 西部地区:农产品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

水平是影响西部地区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经济原因。农产品出口额每增加1%，西部地区的农业对外投资存量平均增加1.14%。这意味着，在西部各省，农产品出口对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两者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大，企业遵循着“先出口再投资”的国际化发展过程。

(4) 东北地区：政策支持和产业规模优势变量对东北地区的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农业支持政策的促进作用很大，政策支持占比每提高1%，东北的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平均增加48.5%。在东北三省，国有经济成分庞大，地方政府对农业“走出去”的支持意愿和能力直接体现在国有企业上，成为促进该地区对外农业投资活动的重要因素。

比较四大地区的决定因素可以发现，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产业规模优势可以为当地企业带来正向的外部效应，对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活动具有积极的推进影响。在东北地区，政府对农业的政策支持是推动农企“走出去”的主要原因，制度因素的影响非常突出。经济发展水平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出口对农业“走出去”形成了明显的带动作用，农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大会促进企业增加对外直接投资。

3.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生产率与对外投资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导致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在此，本研究借鉴田巍和余淼杰^[18]的研究，选用生产率的滞后一期替代当期值作为工具变量，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样本进行重新估计。为了确保模型估计有效，对该工具变量进行了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变量性质良好。

表3的第(4)列显示了2SLS的回归结果。从中可见，使用工具变量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基本一致，农业经济发展、政府的政策支持依然与农业对外直接投资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此外，在控制内生性后，产业规模和生产率变量不再显著，这说明当前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还是依赖于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和政策引导，生

产率的影响程度不大。

五、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基于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本研究测度了对外投资来源的地区分布，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和地区差异，可得出如下结论：一是经济发展、政策支持是决定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中国农产品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未形成明显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不是促进农业“走出去”的主要原因。二是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生产率悖论”，即使不具备生产率优势，大型国有企业仍然能够依托产业规模带来的正向外部效应开展投资活动。三是中国四大地区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有着明显差异性，表现出各具特色的“走出去”推进格局。

上述研究结论就优化地区投资模式和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含义：

(1) 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多重异质性，地方政府应该根据自身的发展特征，因地制宜，采取适合本地区的促进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对于投资比重较小的中部地区，要充分发挥产业规模优势，形成良好的对外农业投资环境。对于地区内差异比较大的西部地区，应避免出现个别省市的“单极突进”，积极发挥出口对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带动作用。在东北地区，国有农场和国有企业是对外农业投资的主力军，民营企业的投资潜力有待提升，当地政府应积极做好引导工作，鼓励民营企业“抱团出海”、集群式“走出去”。

(2)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生产率悖论”，由于当前多数的政策资金往往给予国有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十分有限，因此一些具有农业对外投资潜力却没有政府背景的企业“望而却步”，降低了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质量和增长可能性。在深化农业“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有必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减少公共政策资源浪费，逐步形成以产业规模优势和区位优势带动企业“走出去”的良好局面。

(3) 当前中国正处于农业对外投资的初级阶段，制度和政策因素在降低农业对外投资成本、促进中国农业“走出去”有着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

因此,在进一步的政策制定中,有必要继续推进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营造公平、市场化的对外投资环境,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培育国际化的农业企业为目标,加快构建财政、信贷、保险和税收等一揽子的政策支持体系。在增设农业投资基金的同时,进一步拓宽农业企业的融资渠道,放宽贷款抵押标准,扩大政策性保险基金规模。

注释:

- ①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10 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6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12 个省(区、市);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3 省。
- ② 农业信息采集数据库是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为监测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所设立。目前该机构已连续出版了 2013-2017 年的《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合作分析报告》,作者使用的省级数据均取自该报告。
- ③ F 检验的 P 值为 0.000,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估计模型; $BP-LM$ 检验的 P 值为 0.000,说明随机效应模型优于混合估计模型; $Hausman$ 检验的 P 值为 0.000,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参考文献:

- [1] 徐雪高,张振.政策演进与行为创新:农业“走出去”模式举证[J].改革,2015(3):127-135.
- [2] 宋洪远,张红奎.我国企业对外农业投资的特征、障碍和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14(9):4-10.
- [3] 宋洪远,徐雪,翟雪玲,等.扩大农业对外投资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J].农业经济问题,2012(7):11-19.
- [4] 刘均霆.中国农业向东盟国家“走出去”战略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4(5):86-89.
- [5] 汪晶晶,马惠兰,唐洪松,等.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7(8):88-97.
- [6] 陈伟.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及关键因素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4(11):89-100.
- [7] 陈景华.企业异质性、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服务业行业和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14(7):112-122.
- [8] 朱荃,张天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生产率悖论”吗——基于上市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15(12):103-117.
- [9] 闫付美,张宏.中国生产性服务业 OFDI 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J].经济问题探索,2017(4):126-134.
- [10] Buckley P J, Casson M C. Analyzing foreign market entry strategies :Extending the internalization approac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8, 29(3): 539-561.
- [11] 陈立敏.贸易创造还是贸易替代——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010(4):122-128.
- [12] 裴长洪.国家特定优势——国际投资理论的补充解释[J].经济研究,2011(11):21-35.
- [13] Daly K. Effect of quality of institutions o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7, 16(2):231-244.
- [14] 冀相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制度的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14(9):98-108.
- [15] Peng M W, Wang D Y L, Jiang Y. 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A focus on emerg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8, 39(5):920-936.
- [16] Wang C, Hong J, Kafourous M, et al. What drives outward FDI of Chinese firms? Test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ree theoretical framework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2, 21(3):425-438.
- [17] 戴翔.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生产率悖论及其解释——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13(2):44-59.
- [18] 田巍,余淼杰.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2(11):383-408.

责任编辑:曾凡盛